

冯德英《山菊花》的宗教修辞策略*

陈肖彤** · 刘聪***

目 录

1. 引言
2. 宗教空间的政治转化
3. 宗教观念的政治阐释
 - 1) “脱胎换骨”的政治隐喻
 - 2) “因果报应”的政治寓言
 - 3) “舍生取义”的政治旨归
4. 民间伦理的政治向度
5. 结语

中文摘要

冯德英的革命历史小说《山菊花》围绕胶东乡村地区的革命活动开展叙述，借助宗教修辞的方式呈现出政治话语与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作家自觉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向度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刻改造，为政治话语寻找合情合理的言说前提；同时使严肃的政治革命获得相对通俗的诠释，从而更易引发读者共鸣，有效发挥小说的宣教功能。小说宗教修辞的运用具体表现在宗教空间的政治转化、宗教观念的政治阐释以及民间伦理的政治向度三个方面。

关键词：宗教修辞，《山菊花》，冯德英，政治话语，民间信仰，革命历史小说

*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影视经典与大学生情感教育研究。立项号：YJ201911253。

**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硕士课程（第一作者）

***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授（通讯作者）

1. 引言

宗教与文学向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宗教与文学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¹⁾，二者互为影响，宗教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基础，文学创作又使宗教文化得以深刻彰显。然而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中国并未形成大一统的宗教文化，儒释道等宗教以杂糅并蓄的“民间信仰”形式存诸于世，成为中国民众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20世纪40-70年代，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的共同信仰，传统民间信仰处于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的境地，只能以“宗教修辞”的方式被政治话语整合，隐晦地参与到文学叙事当中。学者黄子平将其界定为“片段性地进入文学叙事而又‘混而析之’的民间信仰文化资源”，“甚至最正统的以讲述党史为中心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无法不从中攫取叙述的合法性资源。而这种攫取往往采取了宗教修辞的方式和途径”。²⁾

“个体在信仰选择过程中总是潜意识地参考传统社会的主流信仰，力图符合文化和大众的认可”³⁾。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山菊花》是冯德英“三花”系列中最具思想深度与叙事广度的一部作品，通过宗教修辞体现出政治话语与民间信仰的深度交融。作为土生土长的胶东籍作家，冯德英深受胶东民间信仰的影响，着眼于胶东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不自觉地从中汲取创作资源，生动展现出胶东地区复杂多元的宗教文化形态，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使小说呈现出浓厚的民间信仰文化氛围。而作为革命作家，冯德英又自觉地遵照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民间信仰进行了全方位的政治改造，以庄严的现实主义笔法再现了胶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本文试图从宗教空间、宗教观念以及民间伦理等角度对《山菊花》的宗教修辞策略进行分析，透视胶东民众由儒释道转向马克

1) 丛新强：《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引言。

2)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3页。

3) 马利军，张积家：《无意识：信仰置换和实践的进路》，《山西师大学报》2017年第3期。

思主义的信仰置换过程，进而探究政治话语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

2. 宗教空间的政治转化

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文本中的空间是作者以现实世界为摹本、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建构的一种空间形式。这种空间形式是形象的、具体的，既具有客观现实环境的某些特点，又蕴含着阶级关系、意识形态等社会特质，具有隐喻性、象征性、层次性、伦理性等特征，因而呈现出丰富的政治权力内涵与社会历史意义。⁴⁾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海面多雾，时常出现海市蜃楼景象，在古人朴素的世界观中被视为海上仙境，历代统治者热衷于到此寻仙访道，因此境内道观庙宇林立。冯德英在《山菊花》中建构了许多源自民间信仰的宗教空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下向政治场域转化，兼具宗教色彩与政治内涵。

《山菊花》所表现的胶东革命斗争活动主要发生在昆崙山地区。昆崙山作为全真教的发源地，自古被视为中国道教圣地，境内存有诸多宗教遗迹，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作者对昆崙山浓厚的宗教氛围进行了细致描绘：“身临其境，如同仙乡神地，真个烟霞洞天一般，可谓昆崙山景中最佳处。这里修有神清观，唐仙姑庙……迄今七真人坟遗迹犹在。”“怪不得，秦始皇东游要从这里走；从汉朝、唐朝开始，在这里修这么多庙、庵；有的皇帝老子亲自给和尚、尼姑送东西，加封号。昆崙山的名字的来历也够美的。传说古代有个女子叫麻姑……”⁵⁾而胶东地区成立的第一支红军队伍也称作昆崙山红军游击队，长期隐蔽在昆崙山与敌人展开灵活的游击斗争，因此昆崙山也被视为胶东地区的革命圣地。党组织时常借助庙宇、山庵等宗教空间的掩护召开秘密会议，游击队遭到围剿时，也躲藏在昆崙山中的道观寺庙，得到道士与和尚的帮助。“无染寺建在唐朝时期，昆崙山主峰泰礴顶下的南岫深处，离山外极远，四周多是野山，

4) 王欢欢：《空间转向与文学空间批评方法的建构》，《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5) 冯德英：《山菊花》（下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74-175页。

鸟道羊路，罕有人迹。于震海几次来此隐蔽，同寺里的和尚沟通了感情。出家人不问他们的事，也不向山外敌人报告，偶尔还有地瓜咸菜招待。”⁶⁾极具神秘气息的宗教空间彰显出胶东地区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民间传说故事的转述则为小说增添了生动的传奇色彩。宗教空间向革命圣地的政治转化显然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暗示着革命活动获得了宗教力量的潜在支持，具有道德层面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除此之外，《山菊花》中还有多处情节表现出宗教空间的政治转化。例如胶东武装暴动突击大队在槎山成立时，作者通过对槎山风光的描绘以及两名队员的对话生动展现出胶东地区朴素的民间信仰：“山并不甚高，海拔四百多米，但因它崛起在黄海岸边，兀自独立，九峰连环，形状奇异，赤松苍劲，多有洞穴，常被云锁雾绕，颇有点‘仙气’。当地歌谣曰：八宝云光洞，九顶铁槎山。登上清凉顶，两手摸青天。”“你可别看不起俺这铁槎山，传说《封神榜》上留名的，当年姜太公封过神在上面。至今这山上还有仙气。”“好吧，等明天我把咱的红旗插山顶上，让那神仙给守着……”⁷⁾暴动失败后，突击队队员刘宝川果真藏身到槎山云光洞，苦苦守护着千疮百孔的暴动旗帜。作者对此情节进行了生动渲染，想要表达的深刻含义是——最终守着红旗的不是神仙，而是革命战士。槎山的飘渺仙气转化为革命的浩然正气，虚幻的宗教空间转化为庄严的政治场域，由此体现出政治话语对宗教空间的改造，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又如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率先发起于天福山山顶的玉皇庙，而随后打响胶东抗日斗争第一枪的战斗地点恰好位于牟平城南的雷神庙。两处宗教空间再度转化为革命圣地，成为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场域。历史的巧合在小说中构成了深刻隐喻，宗教空间与政治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当时文化程度有限的工农兵读者不由产生遐想：革命是否从民间信仰中获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支持？

6) 冯德英：《山菊花》（下集），第237页。

7)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27-428页。

3. 宗教空间的政治阐释

1) “脱胎换骨”的政治隐喻

在多数宗教观念中，人们经受的劫难都是有意义的，是通往美好彼岸的必经之路，而宗教信仰无疑是人们顺利渡劫的精神依靠。在受难与获救的循环往复中，心灵逐渐得到洗礼与净化，最终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愿到达彼岸，皈依到信仰的怀抱。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整体呈现为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可见两种意识形态具有相对一致的发展模式，在革命历史叙事中便表现为“脱胎换骨”的宗教修辞⁸⁾，革命者通常要经历多次磨砺方能被改造为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或革命战士，政治信仰则是“渡劫”过程中的精神支撑，“皈依”的对象自然是革命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革命进程同样是在曲折中前进。

首先，“脱胎换骨”隐喻着个体在身体层面遭受的考验。冯德英在《山菊花》中多次描写了革命者遭受酷刑的惨烈场景，尤其细致地刻画了革命者在受刑时的心理活动，最典型的无疑是由于震海的父亲于世章牺牲时的情景。于世章被敌人吊在赤松树上反复折磨，身体遭受着巨大痛苦仍竭力呼喊，号召贫苦百姓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我到死能相识上共产党，心里喜欢着哪！”于世章壮烈牺牲后，胶东特委庄重宣布：“世章同志牺牲的这天，就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日子！”⁹⁾至此，于世章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意志超越了肉体凡胎的限制，彻底“脱胎换骨”成为一名永恒的共产党员，如愿“皈依”到党的怀抱。由此可知，“脱胎换骨”被默认是入党前必须经历的考验，唯有通过考验才能够获得“皈依”的资格，而对于“皈依”的强烈愿望无疑是“脱胎换骨”过程中的精神依托。

其次，“脱胎换骨”还隐喻着个体在思想层面获得的改造。《山菊花》中的游击队小队长孔居任原是风流的纨绔少爷，家道中落后沦为强盗土匪，他重利

8)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82页。

9)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第202-204页。

轻义，胆小惜命，加入革命队伍后仍存有顽固的落后思想，以个人利益为先，屡次犯下严重错误，甚至意图叛变革命。但在妻子好儿和革命同志的共同感化下，孔居任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作战时奋勇当先，不幸负伤牺牲。临死前，孔居任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诚挚忏悔，如愿获得了好儿的尊重和原谅。作者凝练地概括了孔居任“脱胎换骨”的人生经历：“他孔居任，破落户、浪当子、土匪、动摇分子、共产党员，嘴角上的鲜血，凝固了。”¹⁰⁾从破落户逐渐成长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孔居任的改造过程何尝不是典型的“脱胎换骨”？他以生命为代价赎清了罪行，终于得到党和妻子的认可，即使肉体死亡了，但思想意志得到彻底涤荡，同样实现了精神上的“皈依”。

除此之外，唯有历经苦难方能修成正果的宗教观念也隐喻着革命历程的艰难性与复杂性，胶东地区的革命历史同样是一段“脱胎换骨”的成长过程。在小说《山菊花》中，胶东人民的革命活动遭遇过数次挫折甚至毁灭性打击，过程艰难曲折，情节跌宕起伏。然而胶东党组织每次都从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逐渐掌握了斗争的要领与方向，整个革命队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由盲目莽撞的农民暴动成长为组织严密的革命斗争，由仅有三支手枪、一颗子弹的暴动突击队成长为武器充足、纪律规范的红军游击队，最终发展成规模庞大、实力强悍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番“脱胎换骨”的结果便是革命力量大幅提升，革命形势愈发向好。

2) “因果报应”的政治寓言

“因果报应”观念本是佛教教义，但早在佛教传入本土前，中国民间便已存在传统报应观念。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报应观念在本质上是古代先民一种朴素的道德思维，最早可追溯至《易·坤·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¹¹⁾。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更加具体的因果论，与本土的传统报应

10)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第443页。

11) 郭彙：《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1页。

观念相融合，逐渐沉淀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基础思维。“因果报应”观念的本意是教化人们自觉地避恶趋善，对世俗伦理和社会规范形成潜在制约；而政治革命的初衷可以视作阶级维度上的“惩恶扬善”，同样具有修正社会伦理秩序的作用，于是政治革命与民间信仰所共有的社会使命意识达到了高度契合。因此，政治话语能够自如地借鉴民间信仰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来佐证革命的合理性，同时又为革命的缘由和意义找到了相对通俗的阐释方式，从而有效加深民众对政治革命的理解与认同。

在文学领域，“因果报应”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广泛采用的叙事模式，具体表现在将“报恩”或“报仇”作为构建情节的基本主线，人物遭遇与其性格行为息息相关，最终结局通常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惯例。这一叙事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小说的创作当中。然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个体的仇恨不足以作为政治革命的动力，需要为政治革命寻找更加有力的发生理由和更加深广的表现内容。因此，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往往通过强化阶级矛盾冲突来凸显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使深刻的社会阶级仇恨取代以往古典小说中个体的恩怨情仇，成为政治寓言的核心要义。以“报仇”为关键词对《山菊花》的文本内容进行检索，共出现34次之多。经过总结发现，报仇的主体是胶东地区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民众，仇恨的对象是以恶霸孔庆儒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反动势力，执行者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而报仇的途径和方式无疑是革命斗争。

“因果报应”观念的融入使小说的结构安排和情节发展更加合理，“当作为道德观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作为叙事结构与情节的因果关系达到了契合，作品内在的逻辑性也就得到了突出”¹²⁾。《山菊花》中诸多前后呼应的情节设置均体现出“因果报应”的叙事逻辑，例如主人公于震海为解救贫苦百姓而投身革命是因，多次身受重伤却在群众的帮助下化险为夷是果；萃女冒险解救桃子是因，被强迫沉塘时获得桃子搭救是果；地主孔庆儒剥削百姓、无恶不作是因，冬春楼被革命队伍付之一炬是果……环环相扣的情节结构揭示出革命的根本要旨是“惩恶扬善”，与民间信仰的基本逻辑相重合，可见“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观念已然深刻

12) 刘勇强：《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融入到政治话语叙事当中，成为颠扑不破的政治寓言。

3) “舍生取义”的政治旨归

“牺牲”一词在古代汉语中的含义是“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显然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礼仪有所关联；而在现代汉语中，“牺牲”作为动词使用，意思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¹³⁾，在政治话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在小说《山菊花》中，“牺牲”一词共出现68次，作者多次描写了革命战士英勇牺牲的悲壮场面，并借革命领导者之口阐述了牺牲与革命的关系：“不怕牺牲是很可贵的，没有这种精神，就革不了命。可是我们不是为了牺牲去革命，是为了革命不怕牺牲。”¹⁴⁾词语含义和使用语境的变化彰显出民间信仰与政治话语的深度互动，探究牺牲精神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心理机制，能够透视民间信仰文化对政治话语产生的深刻影响。

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苦大仇深下的献身激情之所以类同于宗教狂热，就在于战争与宗教背后的救世理想都是基于苦难而发”¹⁵⁾。政治话语中的牺牲精神与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思想具有相似内涵，儒家典籍中的诸多箴言均阐明了生命与道义的关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的“舍生取义”思想是凝缩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原型，无疑对中国民众的生死伦理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世间的道德秩序崩溃时，要有以身殉道的觉悟与决心，为道德秩序的重建而牺牲生命。可见在政治话语对民间信仰进行改造之前，中国民众已然具有了“舍生取义”的信仰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吸收与改造，形成了

13)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91页。

14) 冯德英：《山菊花》（下），第302页。

15) 胡传吉：《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一种变迁》，《小说评论》2016年第4期。

现代意义上的生死伦理观，为传统的“舍生取义”思想赋予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为之找到了具体的实践路径，那便是革命斗争。“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¹⁶⁾。“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¹⁷⁾。政治话语对牺牲精神的深刻阐释使死亡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取代了传统的仁义道德成为牺牲行为的价值指向，使传统的“舍生取义”思想有了更加鲜明的政治旨归。因此，小说《山菊花》中所表现的牺牲精神既根植于民间信仰文化中的“舍生取义”思想，又彰显出政治话语的深刻改造，革命者英勇就义的壮举并非一时莽撞的“见义勇为”，而是有着明确理想和信仰基础的主动牺牲。

4. 民间伦理的政治向度

社会学领域的学者认为，春秋晚期孔子在“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¹⁸⁾，使其自古以来便具有天然的宗教特征，各地供奉孔子的孔庙与祭祀孔子的典礼便是儒家具有宗教性质的典型例证。尽管在古代封建社会，“儒的政治正统和学术正统的面向过于强大，往往使得弥漫于在生活层面的宗教性隐而不彰”，但儒家道德伦理、国家政治权威、超自然力量以及民间信仰文化仍在民间社会实现了多重互动，形成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民间儒教”¹⁹⁾。

16)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09-2110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3-134页。

18)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9) 范丽珠，陈纳：《关于“儒”的宗教性与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问题》，《中国儒学》2014年。

在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胶东地区，儒家道德伦理无疑是构建民间信仰文化的重要基础，显著地参与到民间伦理秩序的规范当中，与宗教具有等同的约束力和影响力。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是发展变化的，深深嵌陷在一定的历史过程、社会场域中，不能用绝对的、静止的观念来看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伦理观，社会基础、生产方式变了，伦理观也在发生变化。”²⁰⁾在建国初的特定历史时期，民间伦理受到社会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在革命历史叙事中表现为政治话语对民间伦理秩序的改造。因此，《山菊花》中对革命时期胶东民间伦理秩序的表现同样可以作为宗教修辞加以分析。

“在革命与伦理的关系中，首先面对的是革命如何利用伦理的力量而实现革命的诉求”²¹⁾。在革命历史叙事当中，民间伦理秩序中的道德标准往往成为划定人物政治成分的前提和基础，政治上处于反动阵营的人物大多同时触犯了民间伦理秩序，在革命开始前便已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小说中的反派地主孔庆儒自诩是圣人之后、秀才君子，表面上附庸风雅、恪守礼法，实则为人阴险狡诈，昭然违背儒家伦理道德，与儿媳私通，欺辱族内侄媳。孔庆儒初次出场时，作者便对其道貌岸然的丑态进行了讥讽：“‘丧夫不嫁，逝妻不续。这是孔家门族的礼法。不然还成什么圣人之后！’孔秀才俨然地说，正襟危坐在椅子上。”²²⁾并借次要人物之口对孔庆儒的虚伪行径大加讽刺：“老滑头，孔老二死了两三千年。他硬说他老家是曲阜，秦始皇东游的那阵子，把他们给带到昆崙山这地方来的，真能胡编排，和孔圣人扯上个挂拉，吓唬乡下人。嘿嘿，秀才，花钱买来个秀才帽子……”²³⁾孔庆儒对圣人之后身份的百般重视与强调，以及此身份在乡村社会形成的震慑力，证明了儒家在胶东民间信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孔氏后人的胡作非为与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显然是对儒家伦理的玷污与颠覆。孔庆儒之所以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既因其在政治上是阻碍革命的反动地主阶级，也因其其在道德上是违背民间伦理秩序的儒

20) 陆建德：《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21) 丛新强：《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第219页。

22)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第135页。

23)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第128页。

家败类。作者对孔庆儒的谴责与批判不仅是出于政治革命的需要，也是对儒家伦理的维护与支持，揭示出政治革命具有消灭反动阶级、肃清儒家道统的双重功能。

其次，作者在《山菊花》中也深刻表现出政治话语对民间伦理秩序的改造。例如当父亲于世章被敌人残忍折磨时，于震海的内心经受着政治使命和亲情伦理的艰难抉择：不顾革命大局返回拯救父亲还是为延续革命火种任由父亲牺牲？最终，于震海在“忠孝两难全”的境地下毅然投向了革命而放弃了父亲，个体的伦理需求彻底服从于集体的革命诉求，显示出政治话语对民间伦理秩序的压抑与超越。又如深受父母疼爱的张家大儿子金贵，被地主收买后恶意破坏革命活动，父母坚决要求将儿子处决。母亲三嫂和儿子之间的对话深刻地昭示出民间伦理秩序的政治向度：“你这离开人伙入狼群的东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谁认你做儿？谁认你为亲？谁认你是人？世上有你容身的地场没有？早该自个儿碰死，还有脸叫爹唤妈，哭着饶命！”“好吧，我死，叫你张家断根！”“留下伤天害理的冤种，不如不留的好！”²⁴⁾在拥护革命的三嫂眼中，背叛革命等同于背弃了“忠孝仁义”，任何阻碍革命的人即使是亲生儿子也要坚决消灭，可见政治使命超越了亲情关系成为革命群众的行为准则，政治话语为民间伦理秩序赋予了新的向度。

与之类似的情节还有桃花沟的看山爷亲手劈死临阵畏缩的孙子，同样以一番言辞激烈的怒斥申明大义：“你个奸臣小子听明白啦：你不养爹，不养娘，不管爷一粒粮，一棵草，我都饶你；眼下仁义之师出征，你散漫军心，捣乱革命，家情能恕，公法难容！”²⁵⁾在极度重视子嗣的胶东乡村，儿孙是每个家庭用以传宗接代的宝贵“香火”。父母乃至祖父出于维护革命的神圣责任将儿孙亲手处决，成为“天理”和“公法”的行刑者，无疑是对民间伦理秩序的颠覆与挑战。至此，革命大义彻底凌驾于亲情关系之上，取代民间伦理成为人们的忠实信仰，显示出政治话语对民间信仰的深刻改造。

24)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第399-400页。

25) 冯德英：《山菊花》（下集），第396页。

5. 結語

综上所述，在小说《山菊花》中，冯德英对胶东地区革命历史的言说以民间信仰文化为基础和前提，通过宗教修辞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话语与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和深度交融。但需要注意的是，“并无足够资料证明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对佛道耶诸教有何最基本的认识，然而作品中道观佛堂以及圣地的空间运用，脱胎换骨的身、心、灵隐喻，乃至苦难的救与赎，信仰的罪与罚，都显示了宗教无意识或民间信仰文化在当代叙述中的顽强功用”。²⁶⁾亦即是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当中，民间信仰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隐形的文化资源为政治话语营造“合情合理”的言说前提，并不意味着作家偏离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哲学立场。作为民间信仰文化的表现方式，宗教修辞具象化地参与到当代革命历史叙事之中，作家自觉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向度和时代语境对其进行了改造，使新生的政治话语从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中获得有力支持与肯定。正如有学者所说：“宗教伦理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价值，却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意义内容和表现形式。”²⁷⁾

此外，从接受学角度来看，革命历史小说的读者主要是工农兵阶级的人民群众。尽管在特定历史时期，崇高的政治革命信仰已然遮蔽甚至抑制了民间信仰的存在，但深远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伦理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民众的思想深处，形成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和大众文化心理。因此，作家主动从民间信仰中汲取文化资源，以期为严肃的政治话语寻找相对通俗的诠释方式，同时能够丰富小说的表现内容，增强吸引力与可读性，来适应读者的思维习惯与文化需求，从而更易引发读者共鸣，有效发挥小说的宣教功能。

26)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第4页。

27) 丛新强：《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第232页。

参考文献

著作：

- 丛新强,《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冯德英,《山菊花》(上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
- 冯德英,《山菊花》(下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
- 郭彧,《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商务印书馆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人民出版社编,《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期刊论文：

- 马利军,张积家,〈无意识:信仰置换和实践的进路〉,《山西师大学报》第3期,2017年。
- 王欢欢,〈空间转向与文学空间批评方法的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2018年。
- 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980年。
- 范丽珠,陈纳,〈关于“儒”的宗教性与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复兴问题〉,《中国儒学》,2014年。
- 陆建德,〈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文学评论》第2期,2014年。
- 刘勇强,〈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文学遗产》第1期,2007年。
- 胡传吉,〈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一种变迁〉,《小说评论》第4期,2016年。

Abstract

The religious rhetorical strategy of Feng Deying's "Mountain Chrysanthemum"

Chen Xiaotong · Liu Cong

Feng Deying's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Mountain Chrysanthemum" focuses on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Jiaodong rural area, and present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folk belief with the help of religious rhetoric. The writer consciously follows the ideological direc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o carry on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lk belief, to find a reasonable premise for political discourse;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the serious political revolution get a relatively popular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easier to arouse readers' resonance and effectively play the missionary function of the novel. The use of religious rhetoric in novels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space, th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and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folk ethics.

Key words : Religious Rhetoric, "Mountain Chrysanthemum", Feng Deying, Political Discourse, Folk Beliefs,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

투 고 일 : 2023. 7. 10. / 심 사 일 : 2023. 7. 15. ~ 2023.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3. 8. 20.